

# 2017年德国大选前瞻

□ 吴 江

2017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2月将进行总统选举，3月和5月萨尔州、石荷州以及北威州将相继迎来州议会选举，9月中下旬将迎来联邦议会大选（以下简称德国大选）。尤其是此届德国大选将左右德国乃至欧洲今后几年的政治走向，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 大选聚焦的常规话题

根据德国的选举制度，凡年满18周岁具有德国国籍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每位选民拥有两张选票。第一票用于选出选民所在选区的议员候选人，第二票用于选举政党。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一届联邦议院大选，选举自始至终绕不开“政治家”和“政党”这两个常规类关键词。2017年围绕“政治家”和“政党”展开的常规话题将聚焦以下三点。

### 默克尔是否能够继续当选总理

从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2016年下半年在州议会节节失利的选举结果能够看出，一些选民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颇为不满，不希望默克尔继续执政；还有一些选民对执政12年之久、一直占据总理宝座的默克尔产生审美疲劳，尖锐的批评者更是指责默克尔未能培养接班人。不过令这些选民纠结的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占据了道义的高高点，即使受到指责，但基于德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德国人很难全盘否定默克尔的“欢迎政策”；更让

这些民众为难的是，无论是联盟党还是社民党，这两大德国传统的“全民党”党内都没有比默克尔更为合适的总理人选。而且，虽然执政12年，历经多重危机，默克尔在国内的执政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这当然得益于她的个人能力和口碑，尤其是近些年德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使得即便是面临执政以来的第四次联邦大选，默克尔仍然占据优势。

### 是否继续组成大联合政府

一方面，德国选民并不看好大联合政府，认为大联合政府会导致极左和极右势力的产生，是民主的倒退。默克尔从2005年执政以来已经领导了两届大联合政府，日前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的崛起就被许多专家解读为两届大联合政府的产物，德国媒体也已经开始在发问，德国选择党是否会朝着极右翼方向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希望阻止大联合政府的选民却很有可能导致2017年再次诞生大联合政

府。因为新的小党的成立和发展势必会使得选票分散，当小党无法独当一面，大党票数萎缩时，组建大联合政府很可能是2017年达成的唯一可行方案。

### 是否开启三党联合执政

如果德国选择党2017年顺利进入议会，自民党顺利回归议会的话，德国议会将面临六党鼎立的局面：根据2016年12月16日“德国趋势”的民调结果是：联盟党（36%），社民党（21%），选择党（13%），绿党（10%）、左翼党（9%）和自民党（6%）。如果德国选民不愿意看到大联合政府的诞生，那么在党派增多、票数分散的情况下，2017年的大选很有可能标志德国在联邦层面进入三党联合执政时期。然而三党联合执政是否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性又将是另一个问题。三党联合执政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形式，日前被政治家和媒体讨论得最多、对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从理论上讲最具杀伤力的是由社民党、左

翼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红绿”方案。

2016年12月8日，德国柏林市诞生了迄今为止德国第一个由社民党人主导的“红红绿”政府。需要指出的是，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尽管在州一级的政府层面已经实现组阁，可是迄今为止这三个党要想实现在联邦层面的联合执政面临很多挑战。“红红绿”的组阁压力主要来自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合作，要知道左翼党曾经是作为反对社民党的抗议党而成立的，一旦成功组阁，要么冒牺牲传统选民的风险和社民党作出妥协；要么冒削弱政府执政能力的风险持续和社民党作对。尤其是外交路线上的分歧将成为社民党和左翼党在联邦层面执政的掣肘。当然，最终以什么形式组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德国传统的两大所谓“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较量。

不管2017年德国大选最终花落谁家，德国政党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全民党”的萎缩、政党定位的趋同、找寻执政伙伴的两难、右翼民粹党的崛起……众多问题夹杂在一起，给2017年的大选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 ■ 大选面临的特殊挑战

在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德国2017年大选不仅要聚焦常规话题，同时还要面临特殊挑战。

### 如何提防恐怖袭击负面影响

2016年发生在德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使德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2016年12月19日卡车冲撞圣诞市场的恐袭事件，将恐怖主义带到了德国的政治中心。虽然柏林市大部分民众保持了冷静和克制，并未被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然而，这次恐袭事件折射出的问题，例如反恐措施的疏漏以及难民遣返制度的两难，为德国政坛敲响了警钟。伴随着竞选选情不断白热化，右翼民粹势力将继续利用恐袭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大做文章。一旦德国再次发生类似的恶性恐袭事件，大选舆情将直接受到干扰。如何提防恐怖袭击搅局，德国需要采取更为缜密的反恐策略。

### 如何提防虚假新闻搅局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发展一日千里。随着WhatsApp、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推特以及网络论坛的推广和应用，消息的发布和传播实现了即时性和个性化。然而，实现便捷的同时未能避免新闻的鱼龙混杂。虚假新闻通过新媒体得以迅速传播，欺骗并误导难辨真相的民众，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选舆情。2016年柏林卡车恐袭案案发后不久，WhatsApp上就有人散布谣言，声称恐怖组织计划针对柏林的购物中心进行袭击，引发了不小的恐慌情绪。一旦虚假新闻侵入到民众生活，就容易被民粹分子加以利用，从而影响德国的政治生态。在网络造势方面，德国选择党比其他政党明显略胜一筹。2016年11月德国

# 瑞典怎样有效防治腐败

□ 王 鹏 赛明明

瑞典是北欧最大的国家，也是权力监督体制较为完善、行政效能较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瑞典官员贪污率低于十万分之一。

### 完善高效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瑞典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完备缜密，为瑞典有效防治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从20世纪初开始，瑞典就按照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包括《行政法》《反行贿受贿法》《审计法》等，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反行贿受贿法》将贿赂犯罪的量刑起点额定得很低，规定收受价值超过200瑞典克朗（按现有汇率，约合人民币150元）的礼物就可被视为腐败。1977年，修改了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犯罪主体由公务员扩展到企业职工。1999年，再次对该条款作出修改，使犯罪主体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法庭的法官。2012年，瑞典在立法中增加了“对资金管理不善或者过于滥用资金罪”，加大瑞典跨国企业海外反腐力度。与此同时，瑞典坚持严格执法，有效避免了腐败问题上的“破窗效应”。比如，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因为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价值几十克朗的巧克力食品，被迫辞职。由此可见，瑞典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极低。

### 独立公正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

瑞典实施了很多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实现了全面监督、全民监督。比较特别的制度有社会监督制度。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在他们看来，反腐败不但是专门机关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事。如果一个官员的生活水平高

出收入水平，很快就会有人举报，随后就会有监察官和税务官调查。同时，瑞典民众还通过参与工会等社团组织发挥监督作用。这些组织代表会员的利益，一旦发现政府部门和公务员有不作为或腐败行为，就会向议会监察专员投诉，或者诉诸媒体。为了防止恶意指报，瑞典相关法规明确，凡有恶意指报者，一经发现就将给予其“最低信用评级”。而拥有这样信用评级者，今后若想银行贷款、找到理想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 高度透明的政务公开制度

透明与公开是瑞典政府行政的一条主要原则。根据这项原则，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政府研究工作、法院开庭审判，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随时旁听。目前，瑞典民众有权查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的除外）。为限制政府对政务公开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专门制定了《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这就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故意向公众隐瞒非涉密信息。

### 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

瑞典是高福利、高税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务员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的主观动因。一方面，“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保障了公务员的基本生活。瑞典财政预算的四成多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地方政府的比例更高。在瑞典，无论男女、老幼、有无工作，无论是否对瑞典有所贡献，均享受基本年金的社会福利，包括国民基本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社会救助、失业保险、儿童补助、子女抚养贷款、

### 诚实守信的廉洁从政文化

瑞典历史文化传统悠久，重视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体系的重立，崇尚公平正义和诚实守信，成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支点。瑞典中学普遍开设法律道德课，注意培养孩子的社会正义感和民主法治意识，使孩子从小就养成遵纪守法、纯朴诚实、行为规范、重诺守信的好习惯。瑞典《教育法》中，在价值观部分提出“学校工作人员鼓励学生价值观的尊重”。2005—2014年被定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十年”，通过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法律意识。可以说，公平正义和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已经深入骨髓，成为瑞典国民自觉遵守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国民重视诚实的品质，同时，政府重视诚信体系建设。瑞典的征信系统全国联网，个人如果有不良行为，就会被作为污点如实记录下来，并在求学、就业、晋升时产生影响。公务员一旦涉腐，不仅个人将付出惨痛代价，家庭和家族都将蒙羞。所以，瑞典人从小就都有不良记录为耻。这种视公正和诚信为生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瑞典整个国家的道德建设，也造就了一支廉洁奉公、不搞特权的公务员队伍。

西方社会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洲局部地区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出现回潮甚至兴起，并波及了北美和拉丁美洲原本具有民粹和极端势力基础的部分地域。这股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根源是什么？又会造成哪些后果？

### 极端思潮打破了原有的动态平衡

英国脱欧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打了一针强心剂，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动态平衡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英国脱欧使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面临考验。2010年英国保守党上台后，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基于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派生的新自由主义的执政方案，希望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通过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然而，这种“大社会”方案并没有真正关爱到社会每个群体，阶层分化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百姓的民生、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引发民众对新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心理抗拒。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衰落。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政府二次分配功能和社会平等理念的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兴起，深刻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本身杂糅了凯恩斯主义、费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市场和社会双向运动等思想。近年来，随着福利国家普遍陷入福利陷阱，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式微。英国脱欧则进一步削弱了福利国家的凝聚力。

英国脱欧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势头起到了遏止甚或反冲作用。基督教民主主义是伴随着福利国家生产系统不断衍生出的多样性市场经济制度而产生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之所以近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颇有市场，原因在于其中庸的特性。基督教民主党在政治谱系中的中间位置，既不太左也不太右，并由此而生成使社会融合、阶级妥协以及政治调和状态下的多元性。然而，英国脱欧使得原本式微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回潮甚至复兴，对正处于上升期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而言，可谓当头棒喝。

### 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根源

首先，中产阶级的裂变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阶级根源。研究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在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朝着两个方向裂变。一个方向是极少数部门中产阶级通过勤奋和机遇迈入精英阶层的门槛；另一个方向是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逐步蜕变为贫穷阶层。两个因素使得这种裂变成为可能。一是包括

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如果说工业化时期的贫富差距拉大催生了中产阶级，那么后工业时代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则有可能埋葬中产阶级。如英国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贫困的20%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是欧盟中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意味着中产阶级能够分到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少了。当这种差距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瓜分平民财富的途径诸如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和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被重新踢回无产阶级行列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二是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失业群体的规模。对于包括英国在内陆续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会削弱中产阶级，因为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减少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数量，而低技术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力军。由此，随着更多的中产阶级加入到贫穷和失业的队伍，极端思潮的人口基数成倍扩张。

其次，民主悖论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政治根源。此次脱欧表决采用的全民公投，是古典直接民主的办法。这种方法自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政府普遍采取比例代表制或多数代表制之后，已经很少使用。原因在于这种方式涉及人数多、地域广，投票成本太高，对于古希腊城邦这样的小邦寡民而言是可以的，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则显得笨拙。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在于，古典直接民主包含着一个人民主悖论：民主的本意是让人们自己作主，而直接民主却让相当一部分人被他人作主。

再次，全球化的“脱嵌”效应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经济根源。“脱嵌”一词源于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对社会经济转型的解释，即当社会对市场的张力过强时，市场会本能地脱离社会以继续其市场化的使命。当前，全球化的“脱嵌”效应在英国表现显著。政治上，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分离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发起新的分离攻势；经济上，英镑长期游离于欧元体系之外，成为欧元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对外交往上，英国始终对欧盟通用的申根签证采取拒斥态度。脱欧公投正是在逆全球化或“脱嵌”于全球化的这一背景下出现，于是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开始活跃起来，而民粹主义则成为其中的主要代表。因此，与其说逆全球化或“脱嵌”于全球化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具体表现，毋宁说它是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新点燃的催化剂。

### 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重燃的后果

极端思潮的复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个走向是“脱嵌”之后再“回嵌”，即虽然政治上“脱欧”，但经济上再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之上，这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会强化英国内部的分离力量。苏格兰2014年就举行过是否独立的公投，没有获得半数通过票。去年英

# 英国脱欧公投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思潮

国脱欧公投，形式和程序与当年并无二致却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无疑会激化英国国内意识形态上民粹主义向分离主义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会加强英国在外部与欧洲的分裂。众所周知，自欧共体成立以来，英国就是西欧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不积极者；即便此次脱欧公投英国的精英阶层多数支持“留欧”，但他们通常也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此次政治上的正式“割裂”，具有极强的仪式感和溢出效应，会从心理上加剧英国与欧洲进一步的分离。

第二个走向是持续“脱嵌”，即政治上“脱欧”的同时经济上也不再沿着全球化的常规轨道前进，其导致更为根本性后果是：中产阶级锐减使得民主制度的基石发生松动。近年来，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英国甚至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政治上的“脱欧”与经济上的“例外”会加剧经济风险，可能进一步隐形剥夺中产阶级的财富，导致中产阶级的持续衰减。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外溢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近年来的贫富分化持续扩大，在英国脱欧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极端思潮也很有可能出现井喷式爆发，形成全球化“脱嵌”的滚雪球效应。

战略视角